

新都宝光寺“数罗汉” 民间习俗盛行的人文因素探析

杨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坐落于成都平原的新都宝光寺罗汉堂的“数罗汉”风俗在民间广泛盛行，传承百年，缘由众多。它在建筑和雕塑艺术的物质层面有兴盛之基，而在我们研究的主题因素：即结合人间佛教观念，从佛教礼仪民间化、佛教神文化丰富民间习俗内涵、佛教造像功能影响以及人的心灵诉求等人文社会因素集合上，也有着深层次的盛行之由。

【关键词】宝光寺 罗汉堂 数罗汉 信仰 民俗 人文

在“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彰显着民间智慧光芒和信仰力量、展示着地区民俗繁衍与变迁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新都宝光寺数罗汉习俗尤为知名、沿袭至今并蜚声川西，在国内各地数罗汉习俗中首屈一指。宝光寺数罗汉习俗在佛门内外尤其是广大民间缘何具有浓厚魅力？笔者试图给予适当论证。

一、宝光寺“数罗汉”习俗盛行的物质因素简析

推本溯源，宝光寺“数罗汉”风俗首先得益于寺院本身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非凡的艺术创造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为风俗形成、流传并成为各地最著名一处提供了可靠背景依托，使其因寺院本身宗教正统性和地域权威性而成为可能，又因该习俗的普及发扬、声名远播反归于禅院，为禅院增添了不可多得和或缺的奇异宗教版块和丰富民俗元素。二者相辅相成，促进了香火连绵的千年古刹宝光禅院对社会的良性推动及自身的与时俱进。佛家数罗汉仪式终成喜闻乐见的民俗并非纯粹宗教行为本身的亲民魅力或该罗汉堂在国内诸罗汉堂中堪称翘楚的建筑规模、艺术地位所赐。数五百罗汉传统古已有之，形式与内涵则已刻下不同于旧时气象的丰富社会烙印，赋予大众化的文化符号。时至今日数罗汉实质获得了泛文化解读与深层次挖掘，其外沿则挣脱狭隘、呆板的宗教桎梏，从庄严的佛家框架拓展到全社会心理层面和民族信仰领域，与民间祈禳异曲同工。这一习俗至多不过150余年历史，但在国内此民俗中最富盛名，民间至今仍津津乐道，除所述寺院要素外，著名的罗汉堂作为民俗现象直接承载体，同样至关重要。

宝光寺罗汉堂是我国现存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堂内五百罗汉是国内现存最精美、最完整的清代塑像群。数罗汉风俗史证明，寺院罗汉堂的罗汉建筑水平、艺术高度直接决定该寺和该地区数罗汉风俗的有无或兴衰。而宝光寺罗汉堂就以它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汇聚南北两大流派风格的奇巧雕像誉满禅林，从而吸引着万千信徒与游客慕名前来。罗汉堂建筑结构奇特、塑像布局巧妙，更有精美绝伦的五百罗汉雕像，同时，将康熙二帝真容塑像搬入五百罗汉堂阵容中供奉，体现了封建晚期儒释深度结合后，佛教信仰与皇权思想精神与形式上的双重统一，从根本上来说又延续了宋以来渐衰的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谋求依附封建王权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而生存的儒教化趋势。

以上皆为宝光寺罗汉堂数罗汉兴盛的物质因素，当然它的发展、传播及盛行所具备的社会人文条件同样至关重要。

二、佛教礼仪的民间化

数罗汉曾是佛教礼仪之一。佛教寺院自古以来便有诸多礼仪，以汉传佛教为例，主要节日有佛诞节、腊八节、盂兰盆会，日常行事有课诵、布萨诵戒、过堂、上供、普佛，还有五花八门的法会和日常生活礼仪。但这些礼仪大多深居佛门，远离尘嚣。佛教为了扩大在中国本土的影响，巩固社会地位，必须加强与民间大众的联系。近现代复兴的中国佛教正是在为适应中国社会和人生需要做出随机调整和具备总结性阐释和前瞻性视野的双重自省后，走上了太虚法师及其后继者印顺法师、赵朴初居士倡导的“人间佛教”道路。

佛教深入民间传播发展，必须根据民众水平而从事佛法的弘扬。民众一般只关心“有求必应”的现世利益，只能接受通俗易懂的道理，采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宗教实践。所以这就形成了各种民间佛教习俗，如烧香拜佛、许愿还愿、放生、造像、造塔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礼仪风俗的潜移默化作用远比译经、讲经、创宗、立说等传教方法更为有效，更容易被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同时佛教的传播，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它不但带来了许多新的风俗，也改变了许多旧的体制。¹

这些例子比比皆是。如我国一直有“归土为安”的土葬传统，但古印度佛教“荼毗”（即火葬）东传后，“火葬之俗，盛

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²。腊八喝粥本是佛教节日礼仪，后来却普及为人们喜爱的节令小吃。又如汉地僧人自南朝起的素食传统影响中国民间饮食习惯。这仅仅反映了同一社会习俗佛教化或某一佛教礼仪中国化、社会化进程，完全可以用来类比在行为目的和精神内涵上惊人相似的中国民间祈禳习俗与佛教礼仪中的“数罗汉”。《中华文化通志》载：

民间祈禳：是指民众习惯采用的解决、缓解实际只是从心理上缓解各种烦恼、困难乃至灾难的精神手段，主要建立在信仰上而不是技术性的。除了念佛、吃斋、设蘸等佛教和道教精神手段之外，民间祈禳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常见有念咒、画符、送瘟船、下神、镇邪等。³

今天数罗汉的方式是数到与自己年数相同的某尊罗汉，以其善恶美丑卜定未来吉凶、前程好坏，若求者心切，数到不满意的罗汉，还可改换向另数，直到满意欢喜而去。其实质与民间祈禳异曲同工，将民间化的数罗汉与民间祈禳划为同类社会习俗并不为过。佛教徒的数罗汉仪式渐传民间，“善男信女”们纷纷效仿，得其形而未得其神，但并不妨碍各地罗汉堂兴旺与数罗汉演变为项大众习俗和民间娱乐形式。

三、佛教神文化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习俗的丰富和影响

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佛教在中国发展到数罗汉开始流行的19世纪中叶，其神文化已浸淫到中国士大夫观念和民间大众信仰中，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本土神文化的固有体系与思想内涵。除了罗汉堂已供奉的弥勒、观音、文殊、普贤外，世俗化、故事化的五百罗汉虽不是庄严的佛教之神，但无疑被中国信众和百姓当作能消灾祛邪离苦的神来敬拜、祈祷。

尽管五百罗汉来源众说纷纭，但作为主张“自我解脱”的小乘佛教理想的最高果位，罗汉毕竟被赋予了神的色彩，故包括宝光寺在内的诸多中国寺院亦建罗汉堂。过去常有佛教徒到罗汉堂的罗汉像前虔诚凝视，顶礼膜拜，以期修到罗汉果位。数罗汉礼仪在中国由此定。后来该佛教文化形态影响到宗教信仰者以外的民间人士，许多无神论者在对本土民间习俗一如既往的参与和传承中有意无意地接触到数罗汉礼仪，感受到二者在行为宗旨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深度契合，从而潜移默化地摹仿佛教徒接纳和操作。信徒为修成罗汉果位数罗汉，效仿者则照猫画虎，场面多插科逗乐，随性嬉戏，邯郸学步是也。佛教通过遍布民间的名山大川与平原田野的庙宇金身，渗透在现代纷繁的生活网络与疾速的思考节奏中；现代人也以旅游、朝拜、数罗汉等被注入了市民色彩的方式将个人身心与佛门相联系。可真正了解佛教的微乎其微。但不管如何，数罗汉等活动毕竟丰富了都市人的感性生活，为传统民间祈福风俗催生了更鲜活生动的触摸体验和生命感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宝光寺演变为成都的都市民俗文化和宗教名片。

四、佛教造像的教化等功能对罗汉堂之影响

民间流传的数罗汉习俗兴起包括两大因素，即前述佛教建筑、雕塑等物质因素和社会（人）因素。而连接它们的则是佛教造像本身的教化等功能，它架构起无生命的外化环境、宗教符号与社会的时代性倾诉、人的内心需求的解构式思路。如李建欣言，“都市社会生活的理性化使其缺少感情色彩，人际关系淡漠，都市街道中行色匆匆的人们无不患有‘情感饥渴症’，其干涸、钝化的心灵久已板结固化，因此充满慈爱的佛像正可以疗救其枯燥、机械、沉闷的程式化生活。”⁴

宝光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作为佛教造像，首先是西蜀禅宗分支的信仰产物，“起源于信徒们对佛陀的深切思念与无比敬仰，是供信仰者礼拜供养，以表达敬仰之意或祈求福报，并通过它来领受佛菩萨的佛法教化。”⁵五百罗汉造像彰显着宗教信仰教化功能与完美艺术性和谐完美的结合，主要雕塑者、川东帮著名塑像大师黎广修（正信居士）秉承对禅宗的虔诚信仰和深邃体悟，完成了令人惊叹的罗汉群像，而造像散发的艺术感染力又有效地

凉山彝族装饰艺术的符号释义

刘莹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四川 重庆 400017)

【摘要】凉山彝族艺术中装饰符号的运用一直是一个值得钻研的课题,无论是从其精神意义、装饰意味来看,还是从其文化价值、宗教价值来讲,都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力图从凉山彝族装饰艺术的图形符号和色彩符号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对凉山彝族的装饰符号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剖析。

【关键词】装饰艺术;图形符号;色彩符号

在凉山彝族的装饰图形中,人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将他们认为有意义和具有神奇力量事物图形化的方式,来达到对事物进行控制和长久拥有的目的。在长期进行图形化的过程中,凉山彝族人们逐渐总结和掌握了自己的装饰图形符号,并把这一符号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世代流传。

凉山彝族的装饰符号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的抽象,主要是一些动植物的图形;一些关于灵魂和鬼怪神仙的幻化图形;一些重要生产和生活工具的图形等等。被图形化的事物,形成凉山彝族装饰艺术中的装饰母纹,并最终被规范化、符号化。从视觉艺术的构成角度可以分为图形符号和色彩符号两类。

1. 凉山彝族装饰艺术的图形符号

凉山彝族装饰艺术在装饰图形的处理手法上是灵活多变的。在常用的装饰母体中,我们很少看到完整的装饰对象,多数都是以一种简单、抽象的图形符号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原始图腾符号(图腾崇拜)

在凉山彝族的装饰艺术中,有相当部分的装饰元素来自于凉山彝族的宗教图腾。图腾艺术显示出凉山彝族人民在与自然抗争过程中产生的对自然的期望和畏惧之情,带有强烈的巫术情节,原始人崇拜各种事物,并不是崇拜事物本身,而是崇拜事物后面超现实的灵力^[1]。凉山彝族的宗教和图腾文化是一体的,其装饰也因地、因家支体系的不同,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有互相矛盾的符号出现,例如有的地区彝族的图腾符号是黑虎,有的地方是竹,有的则是葫芦等等不尽相同。虽然彝族的图腾符号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符号在造型特点和色彩的选择上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示出彝族文化中的共性因素。凉山彝族宗教图腾符号它们是由动物、植物或其他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由再现到表现,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2]。凉山彝族的宗教图腾符号是彝族装饰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符号,是凉山彝族传统装饰艺术的精髓和灵魂。

强化其信仰教化功能。罗汉堂正是在这样的宗教背景和美学光芒下形成了地域性领域权威。另外由于禅院具有政治妥协、精神依附和情感回馈意味地将距今最近的两位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帝王塑像以佛教尊者名义纳入五百罗汉序列,显著增强了五百罗汉像的民间感召力,让其以倍加世俗、崇高的入世姿态强势介入民众意识形态领域与日常生活方面,使得数罗汉在成都平原的广大市民阶层和广袤农村中间,较之该地区的其他罗汉堂都获得至上的公信度和说服力。塑造政治领袖同时,塑师也不忘将代表底层劳动人民的世俗形象疯僧、济癫分别以地藏菩萨和降龙罗汉应世出现在五百罗汉像中,下层读书人和坊间酒肉之徒的俗形象真实写照,使佛门之外的大量民间市井阶层感受到来自清净圣地的诚挚亲和力,极大发挥了佛教造像的教化与亲民等功能。四川其他具备罗汉堂的寺院的数罗汉风俗远不及它兴盛,亦不足为怪了。

五、人间佛教的践行与人类心灵的终极诉求

“烟霞无定相,闹市听梵音”。香港僧伽学院觉真法师的诗句形象勾勒了人间佛教意境。赵朴初居士曾将人间佛教特征概括为五要素:人间性、生活性、利他性、时代性、普济性、净化性,其成功之处在于强调佛教徒的信仰取向由原先的偏出世转换为入世。居于喧嚣市区的宝光寺深暗都市寺院定位,为弘扬人间佛教宗旨,大力挖掘自身城市元素,将千年禅院贴上时代标签,对数罗汉仪式有意识的社会推广正是这样的忠实践行。它恰好进行了一项对现代人心灵文化需要、精神生活潜在空间之改善等诸如此类现实课题的生动探讨。

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都市在社会转型的艰难蜕变中由于社会结构的剧变、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群体利益的冲突与调整引发了各种难以治愈的社会问题。文化堕距的社会尴尬中,固有价值观念的破碎与重构历程中的混乱、失范,文化多元化的碰撞与整合,贫富分化与物质、精神的悬殊差距,信仰危机、心理失

(2) 自然符号和生活符号

凉山彝族的自然装饰和生活装饰与彝族的宗教装饰如今已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成为器具装饰美化的手法,一般的图形符号已没有特殊的精神崇拜的意味,即使是原先的图腾符号,其现在所含的宗教和民族图腾文化的含义也大大的弱化了,多数成为表现性的纯装饰抽象图案。只有与人的感性经验相结合时,只有在适合的语境内,才具有特定的意义^[3]。凉山彝族的装饰艺术与其生活状态和文化习俗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用打散、裂解、重构的装饰手法,以自身特有的地域文化习俗和宗教理念为依托,进行装饰艺术创作。在对对象转化为装饰符号的过程中,具有如下特点:一形多意、一意多形、特征化归纳等。例如作为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的一些禽畜的图形符号,并不是完整的将对象图形化,而是进行了大胆的裂解,他们可以将鸡的图形用鸡冠、鸡肠或鸡眼来替构,从鸡这一对象身上就可以分解出直线、曲线、三角形、圆形、点、线、面等基本图形语素,然后通过这些语素的重组形成装饰语言。对凉山彝族传统文化不理解的人来说,看到的只能是一些抽象的几何图形,但对凉山彝族人民来说,则不存在任何理解的问题,在他们的观念里,那些符号与鸡的形象是一致的。

2. 凉山彝族装饰艺术的色彩符号(三色文化)

相对于复杂的装饰图形符号来说,凉山彝族装饰艺术的色彩体系则显得简单、直接、更富有视觉冲击力。在凉山彝族的装饰艺术中,色彩表达的是一种喻意和心理暗示,色彩真实直观地再现了凉山彝族传统民俗文化,并为其创造幻觉空间的效果。只有将色彩同特定的事物构成关联时,才能形成一种色彩喜尚,并在这个民族间将这种色彩喜尚长期地保留下来^[4]。凉山彝族装饰艺术以黑、红、黄为其传统装饰色彩的三原色,辅以少量的其他色彩,在装饰中黑、红、黄三色构成装饰艺术的色彩主基调。在凉山彝族的服饰艺术和建筑装饰中还分别有绿色、紫色、以及白色等其他少量色彩的运用,但从整体上来说,黑、红、黄三色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从现代色彩学的角度来看,这三色的搭配也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通常黑色是彝族装饰艺术的底色,

衡和社会情感隔阂等等系列痼疾,导致人类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生存空间里骤然坠入现漂泊无依的孤独状态,心灵丧失应有的归属感,于是关于人类心灵的终极诉求的呼吁与反省油然而生蔓延。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如马克思所言,宗教只为需要宗教的人们而出现。同理,宗教也会在人类需要的时候发挥其社会功能,从而获得社会对其生存的认可。而佛教尤其是驻扎在都市的人间佛教,作为一种能够修复和满足人类心灵情感的、价值理性之源的、成功嫁接中国理念后的本土化宗教,日益占据了多元化精神需求的重要环节。民间的数罗汉风俗,包裹着喜剧娱乐外衣,却是人们缓解长时间紧张、释放内心压力的缓冲手段,有思辨色彩。它由仪式演化为民间习俗、近年来逐渐盛行于民间,正是因为它具备人间性、生活性、时代性等人间佛教要素,在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畴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精神安慰和心理调适的功效,这是宗教旅游的文化和休闲功能中所阐发的尘世生命之本质,深刻、准确地契合了迷茫而孤独的心灵终极诉求,恰如王雷泉先生所谈,宗教不解决任何人生、社会的实用问题,而是解决人生终极问题的。终极关怀,乃是佛教信仰之本。斯言是也。

数遍罗汉,欲辩真意,已忘言矣。

注释:

1. 圣凯.中国汉传佛教礼仪.第1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8:2
2. 顾炎武(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1196
3. 高丙中.中华文化通志.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0:434
4. 李建欣.从佛教的处境化视域看都市佛教.见:觉醒主编.都市中的佛教——上海玉佛寺纪念建寺12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1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2:427
5. 楼宇烈.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第1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0:395、400